

二十世纪学科体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古典学 ——兼论出土文献在古典学复兴中的作用

曹 峰

摘 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引入日本和中国的西方学科分类体系，把古典学当作了纯客观的研究对象，通过文、史、哲三个门类分别加以研究。一百年之后，文、史、哲各自为政，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彼此间沟通、协作越来越少，这种现象使得古典学研究日渐琐碎化，作为有机整体的古典学已经陷入危机，趋于死亡。然而，近年来，中国出土文献在汉字文化圈大量涌现，由于材料的特殊性，要求文、史、哲不同门类、不同专业的学者乃至世界各国学者通力合作才能展开研究，因此，这项研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汉学界也最受关注。以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为契机，古典学开始走出危机，走向新生，文、史、哲重新整合为一体，中国古典学研究也更为国际化。

关键词：中国古典学、出土文献、全球化、国际化

Chinese Classic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Disciplinary Structur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Importance of Excavated Documents in Reviving the Classics

Cao Feng

Abstract

Owing to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academic classifications in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he Classics came to be considered as a purely objective research area and were pursued under the classifications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 trivializa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 an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collaboration in each subfield-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of the Classics field in the conduct of research, the Classics as an organic whole entered a period of crisis and began moving toward extinction. In recent years, internal divisions between these subfields have become more specialized whil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have diminished.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a large amount of newly rediscovered literary materials has come for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 circle, and the specificity of these materials calls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nd the cooperation of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s a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Not only the Chinese academia but also the global Sinology community has been affected by this phenomenon. The Classics field has viewed this flood of unearthed materials as an opportunity to emerge from its crisis to find rebirth. Additionally,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have become more integrated,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has becom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引言

古典学，是一个世界通用的概念。一般指今人对近代化以前的、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为学方式所作的研究。换言之，是以近代学科分类体系及“科学”的研究方式尚未建立之前的学问为对象的研究。不同的国

家，古典学所涵盖的时代也不尽相同，对于较早进入近代社会、较早采用近代学科分类体系及“科学”研究方式的欧美而言，古典的时代结束得更早一些，而东方则相对较晚。就中国而言，一直要到二十世纪初期，才开始大规模采用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及相应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制度。而日本则比中国要早半个世纪

左右。因此，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到清代为止的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和为学方式当作古典学研究的对象，而从狭义上讲，我们常常把最早期的古代文明即到中国先秦时代为止的文明当作古典学研究的对象。本文基本上从广义的角度使用“古典学”的概念。

因此，虽然每个国家有着各自的古典，然而古典学形成的过程，对古典学加以分类的体系以及研究的方法却是相近的。也就是说，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为学方式之所以没有延续下去，是因为全球范围的近代化过程阻止了其发展和延续，而且，各自不同的古典学被以相同的分类方式、研究方法所审视和剖析，因此中国的古典学也就不再为中国人所独有，而成为世界性的学问，从而产生出欧洲的中国古典学、美国的中国古典学、日本的中国古典学等等。可以说，中国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是西方文明从制度（包括科研制度和教育制度）上影响全世界的产物，如果我们把十九世纪以后西方工业文明对世界文明进程不可阻挡的影响视为一种全球化，那么，中国古典学的诞生也是全球化的产物。

中国古典学建立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不能否认，把古典的知识当作纯客观的研究对象，通过文、史、哲等门类分别加以研究的理念和模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回首这百年历程，学者们也都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文、史、哲各自为政的体制，使得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彼此间沟通、协作越来越少，古典学研究日渐琐碎化，作为有机整体的古典学已经陷入危机，趋于死亡。本文致力于探索这种弊端产生的原因，同时以近年出土文献大量涌现后，分科壁垒自然打破，沟通、协作越来越多为契机，讨论中国古典学再生和复兴的可能性。

一、近代学科体制影响下的中国古典学

中国古典学的诞生既然是全球化的产物，那么就必然会上打上全球化的深刻烙印。这种烙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知识的重新分类和相应学科体系的形成，其次是以西方学术理念和范式为标准的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两个方面的接受并不是同时的，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学科分类和相应科研、教育制度的引进在先，“科学”理念、方法的接受在后。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这个概念，最初对应的并非 science。一般认为，日本人西周是“科学”一词的发明者⁽¹⁾。但有研究证明，西周最初使用的“科学”一词，其实是 subject 或 discipline 的意思⁽²⁾。也就是说，“科学”的含义不是 science，而是“学科”⁽³⁾。

当然，随着西方学术体系的全盘引进，用“科学”一词专门指代 science 逐渐为日本人所接受。受日本的影响，二十世纪以后，中国人也开始使用“科学”一词⁽⁴⁾，但同样有将“科学”理解为“分科之学”的现象，如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今译《国富论》）所使用的“科学”及其他一些场合所使用的“科学”一词也当作西方知识及学术体系下的“一科之学”来理解⁽⁵⁾。

这里，之所以介绍“科学”一词的早期含义，目的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来说明，“科学”进入东方，最初主要是在学科分类的意义上，因此其形式要大于实质。东方首先是在学科分类的体制上引进西学，在建立起与西方学术体制相一致的门类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地、真正地导入西方的学术思想、观念和方法。同时，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西方科学知识和教育体系的引进，不仅仅意味着引入和学习东方所没有的东西，也意味着对固有的学问加以改造，这种改造首先指的是对固有的学问重新加以分类，并纳入到新的教育体系中去。正是在这样一种理念指引下，古典学被置于“人文科学”的框架下，划分成文史哲等门类，走上了和西方学术相匹配的发展轨道。

在日本，明治时期，随着政府欧化政策的实施（例如 1872 年（明治 5 年）的“太政官布告”宣告推行法国的学校体制），西学大为流行，过去以传授汉文汉学为主的学校多被关闭⁽⁶⁾。在大学中，虽然仍然保留了对汉文汉学的研习，但已成为新型教育体制中的一环，成立于 1877 年（明治 10 年）的东京大学，在其文学部中设有“和汉文学科”，力图培养的是学贯东西的人才，除支那经学、东洋哲学、汉文学外，还要必修英语、西洋哲学、论理（即逻辑）、心理学、社会学等西方学术。

有趣的是，这种试图将传统学问纳入新型体制的努力，一开始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变而已，由于没有老师懂得西方的研究理念、方法，和汉文学科的教授多为旧江户幕府以来的宿儒。直到 1885 年（明治 18 年）为止，学生也只有两名。从目前还能找到的东洋大学前身哲学馆（始建于 1887 年，明治 20 年）的讲义来看，虽然出现了诸如《支那哲学》（冈本监辅）、《支那哲学史》（内田周平）、支那伦理史（藤田丰八）之类课程，和《希腊哲学史》等传播西学的课程相并列。但从其内容看，并没有什么新的概念、框架，也没有什么新的方法。《支那哲学》等于是四书学，《支那哲学史》采用的是《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的框架，《支那伦理史》采用的是《汉书·太史公自序》所见

六家的框架。因此并不是近代西学理念下的哲学史，只不过名称作了更换，旧酒装入了新瓶而已。

中国和日本一样，中国传统学术和教育制度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是建立基于分科的新型教育和研究制度。具体而言，即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旧式书院教育体制走向衰落。传统的“四部之学”走向了“七科之学”，所谓“四部之学”，指“四部”之内的经学、史学、诸子学、词章学等传统学术门类；所谓“七科之学”，指以“七科”（文、理、法、农、工、商、医）为代表的文、史、哲、数、理、化、政、经、法、地、农、工等现代学术门类⁽⁷⁾。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代表着中国从文史哲不分、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向近代分科治学的“专门之学”的转变。这项转变，就对西学的“引导”而言，当然指西方分科观念和分科方法的全面引入，而对古典学而言，则表现在对传统学术的“消解”和“拆分”上，因此，一开始难免仅具形式上的意义，出现换汤不换药的现象。下面是晚清宿儒俞樾（1821~1906）写的一首诗，其中谈到了“哲学”：“举世人人谈哲学，愧我迂疏未研榘。谁知我即哲学家，东人有言我始觉。”这里的“东人”指的是日本人小柳司气太，他写过一篇《俞曲园に就いて》⁽⁸⁾的文章，俞樾在读到此文的译文之后，写下了这首诗。可见他对“哲家”“哲学家”这些新概念，带有嘲讽的意味，即便头衔、称呼换了，但在他的心目中，学问的内容和方法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当然俞樾的感受，只是西学席卷中国之初，一种短暂的、特殊的现象而已。在那之后，不仅从学科分类而且从理念方法，中国传统学术被彻底改造，走上了从传统学术转型为“中国古典学术”之路。在严复等人看来，西学取代中学，不仅是因为西学有着传统学术所欠缺的足以“经世致用”的实际功用，更是因为从实质上看，西学有着传统学术所不具备的组织体系与理念方法。尤其后者，是严复等人所大力宣扬、积极倡导者，严复指出：

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厘然，夫而后得为之“学”……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⁹⁾

这样看来，在严复眼中，真正的“学”必须有组织、有系统，即所谓“部居群分，层累枝叶”“首尾赅备，因应厘然”。而且是可以论证、可以定义的。用此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之学，则“如散钱，如委积”而已。

如果说中国古代“四部之学”并非有组织、有系统，那是不合理的。“经史子集”显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以“经”为首，以“史子集”为辅的体系其实可以将所有的知识容纳进去，而且这个系统是有层次的，“经”基本上和形上之学相应，而其他知识则是为传扬、实践“经”所反映的理念服务的。因此这是一种“活”的学问，也就是说，学者和他所研究的对象、为学与为人息息相关，联成一体，成为生命本身，死而后已。知识分子倾其毕生精力研习古籍，并按照古典的世界不断地重塑自己的精神，结果在各自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地成为古典世界的化身或代言人。因此，即便为学之人最终偏重于“四部之学”的某一方向，也会因为“四部之学”整体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关联性，而不至于出现严重的偏科。同时，学者和学问之间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是冷冰冰的关系。按照西学的理念，不仅自然科学，即便人文科学也要求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要保持距离，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和立场，在研究对象面前，研究者不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不能显露自己的情感，否则就会影响自己得出完全客观的结论。

当“四部之学”被纳入“七科之学”后，如前所述，首先是被以“科学”的名义重新审视、重新分科。其次是成为了“科学”的对象，不再是一种活着的学问，而是在新的学术框架、概念、方法下可假设、可定义、可分析、可论证的“古典学”对象了。在这样的理念背景下，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也就必然受到推崇。

二、二十世纪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三种类型

二十世纪是“古典学”发生、发展、发达的世纪，要在这样一篇小文中，对二十世纪“古典学”的长短功过作出全面的审视是不现实的，我也无意否定人文科学背景下“古典学”的许多成就，在此，我想通过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梳理出古典学产生之后的主要线索，对这门学问之所以会日渐琐碎化，开始陷入危机的原因作出探索。

西方学科分类体系大规模引进之后，在中国古典学研究方面，有哪些影响深远、值得重视的学者或学者群呢？在此，我想分成三种类型加以论述。第一种是几乎看不到争议，直到今天仍受到极高评价的学

者，这可以王国维为例。王国维短暂的一生，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成果。作为新旧交替、文化转型时期的人物，他有着“四部之学”的深厚功底，但他出色的研究成果，又几乎都是新的学科体系创建之后形成的。王国维对西方学科分类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对其长处有着深刻认识：

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¹⁰⁾

他的一生，纵横于文史哲三个领域，早年醉心于哲学，中年潜心于文学，晚年归心于史学。一般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随罗振玉避难日本之后，学风大变，尽弃西学，回归古典之学。但实际上如刘东指出的那样，他中晚年虽然埋首“经史小学”，但实际上他的学问是“以西格中”的产物。

必须警觉地看到，即使在他被说成是尽弃所学之后，由于他心里还是认定学术不分中西，所以他那种针对中国过往文化经验所提出的问题，还主要是从西学的基点上发球的，还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强有力制约。

也必须警觉地看到，他的国学并非传统文化的原义，而乃以西格中的产物，如果不能时时牢记到这一点，而径直把他的某些判定——那些被发明的传统——看成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那么就会陷入迷宫。⁽¹¹⁾

同王国维有过交往的日本著名学者狩野直喜也说过：

“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卓越之处。”⁽¹²⁾那么，王国维是如何利用西学眼光来审视中国古典的呢？这里，我无法作详尽的论述，仅从王国维开拓的领域，可以看出新型的学科分类和学术理念对他产生的影响，从1911年到他自尽的1927年，他辗转于文学、美学、甲骨学、金石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目录、古史学、西北史地学、简牍学、敦煌学等领域，几乎在每个领域都作出辉煌的成就。尽管

这里面不少领域是中国传统的学问，但我们可以发现，即便和中国传统学术重合的领域，王国维也是受到了西方汉学或日本“京都学派”的影响，也就是说，仅仅延续中国传统之学，是不可能造就如此辉煌的。王国维其实是在西方的“中国古典学”领域，利用自己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优势，建树起了更多的成就。而他的学风则接近于“强调确实的事实、注重文献的考订、推行原典的研究”的实证主义理念⁽¹³⁾。因此，由王国维提出今天评价甚高的“二重证据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王国维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在于他成为中国推行西方的学科分类体制后，在许多新的领域都有开拓之功的先驱者。可以说，他充分利用了自己能够融会贯通文史哲的优势，在不同的领域任意遨游。他四处出击，广泛建树，但不固守在一个专业。这样就避免了今人视野狭隘，学问越做越小的弊端。

王国维的眼光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超前的，一方面它积极利用西方学科分类体系，凭借他雄厚的国学基础，开拓出无数供后代研究者继续前行的新领域。但他又不受专业的束缚，不使自己的学术走向狭隘和琐碎。同时，他也注意提升学术的品格，使学者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竭力避免学术形而下化之后必然走向庸俗化，离开道德与精神越来越远的弊端。

第二种类型可以东京大学的古典讲习科和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为例。设立于1882年（明治15年）的东京大学的古典讲习科分为甲部“国学”（即日本的古典学）和乙部“汉文学”两个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挽救日本全面西化之后迅速衰落的汉学、儒教。学生可以免修外语，教师由岛田重礼、中村正直、三岛毅等宿儒担当，也有西方留学回来的井上哲次郎，毕业生中人才辈出，出现了林泰辅、安井小太郎、市村瓊次郎、瀧川龟太郎、兒玉献吉郎等一大批重量级的学者⁽¹⁴⁾。设立于1925年的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即通称之国学研究院），同样也有挽救国学于衰亡的使命，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均受过西学的熏陶，学贯中西，而学生则多有深厚的国学基础。此研究院开办仅四年，共录取74人，完成学业68人，其中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等等，日后都成为中国二十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就办学宗旨而言，清华国学研究院特别强调新型的国学研究之道，即“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

成绩。”⁽¹⁵⁾但并未显示出西化的特征，从相当多的毕业生日后的研究成果看，促使他们获得成就的理念与方法，显然更多得益于他们早年扎实的古典训练。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进入了现代学科分类体制，但这些人成就之形成，似乎主要不是得益于西学的训练，反而是得益于有意识地与西学保持一定距离。如下文所要讨论的那样，过度的西化对于古典学而言，反而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第三种类型可以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以及二十世纪的逻辑学研究为例。胡适的中国哲学有着鲜明的倾向，就是要借助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重述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¹⁶⁾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适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有一个相当强烈的愿望，就是按西方能够理解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同时让中国的思想走向世界。梁启超在评价这部书时，毫不客气地指出：“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论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这是因为墨子、荀子有接近于西方的知识论和政治思想，因此也最容易用西方的概念框架来描述。梁启超认为以知识论来讲孔子，只是“弃菁华而取糟粕。”因为知识论在孔子哲学中只占得第二、第三的位置。孔学的根本精神是如何做到“我的思想行为与我的生命融合为一”及“我的生命和宇宙融合为一”，孔子的“学”并非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言“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而是“活动”和“体验”。⁽¹⁷⁾

胡适之后，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一般认为比胡适更具有系统性，但在梳理中国的材料以塞入西方的框架之特征上与胡适没有什么两样，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说：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¹⁸⁾

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¹⁹⁾

对此，著名哲学史家劳思光有严格的批评，“冯书中

确有哲学，但并不是中国哲学”、“冯书虽然有‘哲学’，但并不与中国哲学的主流相应”⁽²⁰⁾。劳思光认为冯友兰套用西方哲学的分类法来解释中国哲学并不能涵盖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更失去了中国哲学的精神。

二十世纪之后，使用西方的模式、带着西方的眼镜在中国固有的材料中寻找相应的学术成为时尚，当然和全球化有着必然关联，这种关联不仅是来自外部的压迫，也来自中国自身内在的需求。当中国人意识到西方的先进主要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着“科学”的、亦即逻辑的思维方式时，在中国固有的思维中找出可与之相匹敌的东西，就成了紧迫的工作。胡适的博士论文《中国名学史》的出现绝非偶然。“名学”、“辩学”不仅成为深入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明精髓的桥梁和捷径，甚至成为激发起中国比西方更优越的民族自信心的良药。因此二十世纪中国逻辑学研究的兴盛可以说其实是文化上缺乏自信所导致的，是一种虚假的、存在缺陷和偏差的“兴盛”。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领域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方向性的错误，表现为不顾“名家”所生存的思想史环境，将西方逻辑学概念、框架、方法简单地移植过来，有削足适履之嫌。二十世纪后在西方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有时甚至曲解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将其当语言学逻辑学材料来使用。自从将“名”、“辩”与西方逻辑学相比附后，只要谈到“名”，似乎就只能从逻辑的角度出发。这样使很多看上去与逻辑学无关的“名”的资料被轻视，被闲置，甚至被曲解。特别是那些伦理学意义上、政治学意义上的“名”，虽然是中国古代“名”思想中不可割裂的、有机的、重要的成分，却因为西方逻辑学研究的思路而得不到正视，得不到客观的研究。这就出现了《荀子》的《正名》篇，到了逻辑思想史学者手中，只看前半部分和所谓逻辑相关的内容，不管后半部分论道论心之内容的奇怪现象，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²¹⁾。

二十世纪中国古典学还和国运密切相关，二次大战以前，日本尤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儒教研究几乎完全是为培养国民道德、维护天皇体制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古典学受政治控制的特征更是明显。虽然保持文史哲的近代学科体制，但在概念、框架、理论上教条化的倾向更为严重，这些情况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上面论述的三种类型，基本上都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期，但我觉得其影响延伸到整个二十世纪，从这三

种类型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中国古典学命运的变迁。中国古典学既是西方学科体制的产物，其模式、框架、概念无不深受西学的影响，又受制于中国古典自身的特点，也就是说，即便有深厚的西学基础，没有深厚的国学基础，那也不可能获得影响长远的学术成果。只有既能在形式上利用学科分类之便利，又能在事实上不打破中国古典有机整体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最高的成就。这人就是王国维，但王国维是独一无二的。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许多毕业生在不同的领域各领风骚，其成就为不同学科奠定了基础，但在对古典把握的整体性上已不可能和王国维相比。然而，即便是这些某一领域的大家也越来越少，现在，文、史、哲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彼此间沟通、协作越来越少，各自为政、划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日益严重，这种现象使得古典学研究日渐琐碎化，作为有机整体的古典学已经陷入危机。这种危机可以用“西化”基础上的“细化”来表示，一方面过度西化的研究方式⁽²²⁾虽然引起许多学者的警惕，并试图纠正，但“以西格中”。为了某种理论或假设的成立而不惜断章取义、削足适履的现象仍十分多见，使得中国古典学日渐脱离其本来面目，成为一些学者谋生的工具或掌上的玩物。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古典缺乏有机和整体的把握，目前的学者以及正在培养的新一代学者所作研究更多是掘井式的，但由于视野的狭隘，可供开掘的有价值的井已经越来越少，使得中国古典学的生机不免走向衰微和枯竭，我们越来越呼唤给中国古典学注入活力的契机。

更可怕的是由于知识爆炸，学者们看自己学科的论文都来不及，难以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关心其他学科。同时，每个学科各有各的话语体系，评判标准、各自的刊物、学会。在某种程度上，学科体系成了势力范围，使中国古典学在平庸中慢慢死亡。个人无能通观和整合，而体制也扼杀了通观和整合的能力。近年开始大量出现的国学院、国学班可以说是一种扭转的努力，但依然受制于学位体制，难以有大的作为。

三、出土文献在古典学复兴中的作用

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借助回首百年，在中国国内，包括文史哲各个方面，对自身的性质、研究的方法、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与意义，今后发展的方向，都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例如史学界围绕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论能否适用于中国，如何评价上世纪古史辨派的功过，上古史研究是否需要“走出疑古时代”的

问题，文学界围绕西方文论指引下的中国文论“学科史”是否导致“学科死”的问题，中国哲学界围绕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主体性问题，“援西释中”、“反向格义”的成败问题，有大批反思的文章出现。

这些反思更多注意的是西方的概念、框架、思维模式、研究方法是否适合于中国古典学，以及中国古典学如何走向新生。然而这种讨论仍然是以文史哲为单位展开的，也就是说，仍然受到西方学科的限制。虽然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难以为中国古典学的新生提供直接而实际的机会，以扭转“西化”基础上日益“细化”的颓势，为中国古典学重新整合带来契机。

笔者以为，近年大量涌现的出土文献或许为我们提供了复兴中国古典学的有效的机会。随着中国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深埋于地下两千多年，用竹简、木牍和缣帛抄写的先秦秦汉文书，大批大批地呈现于世人眼前⁽²³⁾，以思想史领域为例，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岳麓书院藏战国秦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都堪称惊人的发现，加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马王堆西汉帛书、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等无比珍贵的资料，历史的窗口一扇接着一扇打开，从每一扇窗看出去，风景都格外精彩，现在投身其中的学者越来越多，说中国古典学已经进入了“简帛时代”，绝不为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随葬于先秦秦汉乃至魏晋三国古墓中的古代文献，以一种原始的、自然的状态呈现出来。例如，出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马王堆帛书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古代历史、思想、天文、历法、地理、军事、医学、数术等各个方面，好像一部百科全书。不仅仅包括所谓“精英”的思想和文化，还包括大量阴阳五行、天文、历法、算术、星象、占卜、释梦、医学、养生、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葛兆光称之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内容⁽²⁴⁾。出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呈现出复杂的儒道关系。文本的不确定性，思想的丰富多样性是出土文献的显著特征⁽²⁵⁾。

这些未经后人染指的出土文献，仿佛将思想定格在了时间的某一刻，其文本形态往往凌乱不齐、其思想面貌往往杂芜纷呈，但却保留了思想生动而鲜活的特征。如果我们要在里面寻找统一的线索，纯正的概念，以佐证后人整齐加工之后的体系，往往会令人失望。因此，不仅难以用文史哲的西学框架，甚至难以用“四部之学”“九流十家”、“六家”的方式去分类。也就是说在一个墓葬中出现的文献往往极为复杂，而

同一篇文献中也未必显露出清晰的学派面貌，可以供我们轻松地塞入今天的学术框架中。

借助最新出土文献，使一系列新的、过去无法想象的论题被激发出来，如孔孟荀之间的儒学展开、孟学和荀学的源头，老庄之外的道家轨迹、黄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异端思想、从《易经》到“易传”的传承和谱系，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论、重视自然之情的人性论，数术方技和阴阳五行思想与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联系，等等。由此而被激活的或引发出来的研究课题有学派判别、经典确认及其文本演变的问题、天人关系论、儒道关系论、齐楚文化关系论、传世文献价值的再评价、乃至“疑古”和“释古”关系的大讨论，等等。这些问题有很多都是跨学科的。因此，可以说，出土文献为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新认识提供了革命性的契机，为古典学的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出土文献的研究必须依靠多学科通力合作，仅仅依靠某一个领域是无法胜任的。这种通力合作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横向看，考古、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历史、思想、哲学都必须参与进来，甚至数、理、化、工、农、医、占卜、天文、历法、饮食等领域也必须加盟。从纵向看，从事出土文献研究的学者必须密切关注了解、懂得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出土文献仿佛是一潭池水，最先向其中投入石子的是从事考古及古文字研究的人，这批人比较少，产生的波纹也比较小。其次向其中投入石子的是研究学术史、思想史的人，这批人相对较多，产生的波纹也比较大。当更多的人、更多的学科向其中投入石子时，产生的波纹也就越大。没有不同学科，甚至同一学科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协同、合作，就不可能得出为学界公认的结论。以思想研究为主的学者如何尊重、消化前期文字文献研究者的成果，文字文献研究者如何理解、吸收后期研究者的立场观念，是促使这门学科今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虽然前者为本、后者为末，但其实一开始就是相互尊重、相互融通，取长补短的关系。总之，出土文献必须借助各方之力，同时又要求研究者注意各方面之研究成果，互为条件、互为补充，由此也有利于培养出新一代的学者。

出土文献研究这种跨学科的性质，使其成为古典学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的会议相当多，论文也极为丰富，同时催生出新的学会，例如日本的中国出土资料学会，是日本国内包涵学科领域最为广泛的学会，反观中国，尚未出现这样的学术组织，实在令人遗憾。

出土文献还是目前最为国际化的研究对象，它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其中。不知道出土文献，已没有古典研究的发言权。日本学者有着深厚的古典学基础，投身出土文献研究也非常早，已形成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而欧美学者在文本研究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在文本的书写和结构、口头传播的影响、作者的概念、书的概念等问题的讨论上极为活跃。世界古典学研究的经验和知识正在得到借鉴。因此，日益兴盛的出土文献研究已使一种新的古典学由然而生，这是一种被考古发现逼出来的古典学，它逼着现行学科体制中的学者跳出自己的领域，去关心、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它逼着现行学科调整已经僵化的体制，以适应充满生机活力的新材料，迫使现有的观念，现有的问题意识、现有的研究方式发生改变。而且这种回到古典的研究也不易受意识形态、时代潮流的影响。

总之，由于材料的不同，参与者的不同，使用方法的不同，简帛研究的研究将不同于以往文史哲任何一门学科。这不仅将刺激、促进我们反思二十世纪将文史哲分而治之的不合理性，而且，还完全有可能通过简帛研究使文史哲重新走向合流，成为一门综合的古典学。因此，就古典学而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简帛研究的时代，恐不为过。如何以理智的态度和创造性的智慧把握住这次机遇，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注

- (1) 明治三年末，西周在私塾育英社使用题为《百学连环》的讲义，系统介绍西方的知识体系。其中首次出现了“科学”一词。铃木修次对 science 概念传入日本以及译词诞生作过详细的梳理和论证。见铃木修次：《日本汉语与中国》，东京：中央公论社，1981年。详参其书第二章。
- (2) 参见飞田良文：《明治生まれの日本語》，京都：淡交社，2002年，第205页。
- (3) 沈国威：《严复与译词：科学》，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
- (4) 在中国究竟谁最早使用“科学”一词，又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的，学界研究甚多，主要可参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0卷第3期（1988年）。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近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 (5) 详参沈国威：《严复与译词：科学》，第121-137页。
- (6) 近代日本文明开化之后汉学者的命运可参三浦叶：《明治の汉学》，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町田三郎：《明治の汉学者たち》，东京：研文出版，1998年。村山吉广：《汉学者はいかに生きたか》，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年。
- (7) “七科之学”正式形成于1913年初，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大学规程》。“七科之学”正式形成之前，

- 已有不少人提出学科分类之理念并付诸实践，例如，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联名上奏的《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以日本“六科分立”制为蓝本，提出了大学分设经学、史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等科的“七科分学”方案。关于中国近代学制的演变，可参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 (8) 此文刊载于《哲学杂志》第21卷，明治39年（1907）3月号。
- (9) 《救亡决论》，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页。
- (10)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7b-98a。
- (11) 刘东：《重估王国维的“尽弃西学”》（未刊稿），转引自方麟：《王国维学术思想评议》，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2012年9月，第8页。
- (12) 狩野直喜：《回忆王国维君》，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95页。
- (13) 这是严绍盪对“京都学派”学风之评价，参见严绍盪：《日本中国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3页。
- (14) 战前日本“京都学派”也有类似的特征，这里限于篇幅不做展开。
- (15)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 (16)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 (17) 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之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第60页。
- (1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页。
- (1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第8页。
- (20)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
- (21) 详尽论述可参曹峰：《二十世纪中国名学诠释的偏差及其历史原因》，《中国诠释学》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曹峰：《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2期；
- (22) 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日本小岛祐馬、中国郭沫若、侯外庐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同样是西化的产物，只是路线不同而已。
- (23) 这种现象不仅止于中国，在日本、朝鲜半岛也有类似现象，例如近年在朝鲜出土的木简《论语》，就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
- (2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 (25) 详参曹峰：《价值与局限：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